

# 杨朔散文的结构艺术

范昌灼

文学作品的结构，是对用以表现和突出主题的题材（人、事、景、物、情）所作的组织安排或艺术布局。它是整个艺术构思的一个重要环节，对于揭示主题，增强美感和引人入胜，都有直接的关系。文学作品的结构，往往容易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特色与艺术风格。散文的基本结构常常表现出以散开为能事，引伸穿插，纵横错综，不拘一格。杨朔的散文独具风格，这是众有定评的。但是，对于它的结构艺术，却存在着不同的评价。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## 一

抑扬错综，进退相间。由此构成他的回廊婉转之态，颇能增强读者探索内容的兴味。这是杨朔散文结构的第一个特色。这一特色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一、恰当反映和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。比如《荔枝蜜》，起笔写“我”“总不大喜欢”蜜蜂。因为小时爬树叫它螫了一下，痛得几乎跌了下来。之后，“每逢看见蜜蜂，感情上疙疙瘩瘩的，总不怎么舒服”。这是思想感情的“抑”。既不喜欢蜜蜂，还有什么可写的呢？但后来，因为吃了蜜，“觉得生活都是甜的”，“不觉动了情，想去看看一向不大喜欢的蜜蜂”。随之，细写了蜜蜂的生活习性，如何酿蜜等情况，思想上对它产生了好感。这是思想感情的“扬”。最

后，由蜜蜂的酿蜜，悟出了不少现实的人生哲理——劳动人民辛勤的劳动，建设自己的生活，“实际也是在酿蜜”。就这样，由讨厌蜜蜂转为热爱它，甚至竟“梦见了自已变成了一只小蜜蜂”，更是思想感情的“扬”。这种思想感情的起伏导致了结构呈跌宕波澜之势；抑是为了扬，退是为了进。由于全文总是以赞颂蜜蜂为基调，这种赞颂的思想感情的融注，使结构又显得谨严有致。

二、表达所写人物的思想、情态的起伏。例如《樱花雨》，先放开写了日本侍女君子初出面时的文静、“胆怯”、“柔弱”情态。她对于外国“恶狼”的欺凌，不敢多言，欲言却止；不敢细想，“看不见自己的明天，更看不见日本的未来”。这是一种“抑”的状态。接着写因为一夜风雨，把樱花催咧开嘴，她才出现了温柔的笑的情态，行文初有所“扬”。随后因突然停电了，她“忍不住自言自语悄悄”说了一句：“敢许是罢工吧？”柔和的眼睛里，跳出两火花，揭示出了她“怯生生的心灵里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”。这真具有含蓄深沉、意犹未尽、策人深思的“神味”；反映在行文上，是进一步的“扬”。人物的这种思想情态的变化，制约作品的结构，使之曲折多变。然而，由于全文是集中表现“风雨中开放的樱花，才真是日本人民的象征”这一思想，由于全文始终有作者喜忧起伏的思想感情的灌注，就使结构井然有序了。

三、反映对事物描写的似尽非尽的笔触。比如《泰山极顶》，作者登山的目的在于观日出，故以看日出贯穿全文。首先写“爬山那天，正赶上个难得的好天”，大有“可以看见日出”的希望。一开头，就给人以欣喜之感，这是“扬”。但是“爬上了南天门，走上天街”，天气却变了，到夜色降临之时，竟出现了急人的景象：“山头忽然漫起好大的云雾，又浓又湿，悄悄挤进门缝来，落到枕头边上”，而且“还听见零零星星几滴雨声”——看日出将是不可能了。这里，力状天气不佳，写出心头的焦虑。到天明后，天气没有好转，果真不见日出。这一段，陡然抑住，抑得连读者也为之叹惋，使行文充满先喜后忧、先信后疑，进而出现“山穷水尽”的地步。然而这个“抑”，却又对下文的“扬”作了有力的铺垫与烘托；笔调依然奇崛、奔放。最后，到了泰山极顶，却望见了“一幅无比壮丽的奇景”，看见了“另一场更加辉煌的日出。这轮晓日从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平线上一跃而出，闪射着万道红光”；歌颂了“如日之升”、欣欣向荣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。写到这里，文势着力一扬，倏然给人以精神和力量，达到了忧而后喜、疑而后信的境界。类似这样的例子，在杨朔散文中，还有不少，致使作品的结构呈波澜起伏之势。

散文是十分讲求结构艺术美的。它要在“水穷山尽之处，偏宜突起波澜”（李渔《闲情偶寄》），从而给人以丰姿多采、峰回路转、境界深邃的艺术感受，给读者以思索、回味的余地。杨朔散文结构中的上述特色，就足以起到这样的作用。这些，都不是离开生活实际或离开实际感受而杜撰的，而是从生活出发，根据事物对立统一的法则，注意相反相成，符合认识规律的；是作者对艺术辩证法纯熟运用的生动体现。

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，这已成为人们用于谈文章结构的通俗语了。散文的结构更忌

平铺直叙，单调板滞，而重在相反相成，辩证统一。这种起伏波澜、曲中有曲的结构艺术，历来被人称为“伏脉”，就像山脉相连、峰谷绵延、迂回伸展。因此，它极有艺术魅力，能引人进入佳境，叫人有攀缘山径、盘曲而上、愈上愈神奇的感觉。

## 二

杨朔散文结构艺术另一突出的特色是：开端有如雨后放晴，结尾有如清歌送耳。因此，体会起来，叫人爽心，耐人寻思。它们有助于作者思想感情和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，从中清楚地体现了整个作品十分精巧熟练、富有工力的构思和布局。

杨朔的作品，是“开门见山”的，但又不是“若一山壁立，当门而峙”，而是如见远山，“以缥缈遥映为胜”（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）。它往往以寥寥几笔，就能立即将读者引入思索的境地。它或写出特定的气氛，创造一种诗的境界；或点示出作者的思路，引起读者的共鸣；或故设某种疑问，创造悬念，抓住读者；或给全篇定下基调，暗示文路发展的目标，等等，犹如一折引人入胜的、情味浓郁的开台戏。例如《金字塔夜月》，是赞颂埃及人民创造、珍惜古老的文明，将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它开头就写，“我”于夜月中去金字塔，不是寻梦，“倒是想亲自多摸摸这个民族的活生生的历史”。作者的思路，一笔透露了出来。这个开头，牵动着读者也同作者一道去了解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的情思，颇有先声夺人之妙。在这方面，《茶花赋》尤为精巧。开头写久在国外怀念祖国，而不能见到她，就想画一幅体现祖国特色的画，“时刻挂在眼前”。这种感情是真挚的，这个设想是自然的。但要以一幅画来象征祖国面貌，却不易做到，因为一幅画上的“零山碎水，一人一物”不能够表现祖

国丰姿多采的面貌。这就为下文抒写茶花，特别是写童子面花，以它象征祖国面貌，伏下了笔墨。这个开头是新巧的；它隐而不显，寓对祖国之深情于绘画之中，起到了策人深思、启人联想的作用。

“一篇之妙在乎落句”（周振甫《诗词例话·结尾》）。杨朔散文的结尾，大都体现了“全文之气在此凝集”，堪称点睛之笔。它有引喻，则贴切、深刻；有联想，则丰富、高远；有诗意，则深邃、优美。如《晚来急》一文是歌颂葡属几内亚革命家葛伯勒坚毅乐观、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，结尾写道：

大西洋正涨夜潮，潮水滚滚而来，卷起一大片震撼天地的吼声。葛伯勒点起支烟，缓缓地谈起他祖国的历史，他祖国的命运，他祖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。……他的话音落进汹涌的潮声里，一时辨不清是葛伯勒在说话，还是晚潮在吼……

这个结尾，使读者看到葛伯勒爱国的心潮已经溶入大西洋的滚滚浪潮里了；大西洋的浪潮，正是无数个葛伯勒的“烈焰腾腾的热情”汇涌而成的巨大浪潮。它还会引人联想，使人相信：晚潮都如此急，则曙光必将来临，胜利即在眼前。这个结尾，真是言外有意，耐人深思，情景相融，意境豁然。类似这样的结尾，在杨朔散文中，开卷可见；或补充以议论，引出和点明事中所寓之“志”，或通过抒情明示主题，开拓内容，等等，都有使人沉思默想，心驰神往，叫人品之不厌、味之忘倦的魅力。白居易提出“卒章显其志”（《新乐府·序》），主张诗的结尾要揭示主题，要将揭示的思想像火石花般地闪射出来，做到奇突而有光采，从而深化思想。杨朔散文的结尾，也体现了这一点，犹如一出使人看后不忍离去的压台戏。因此，它决不是所谓“没把‘睛’点到‘眼’上”而成了“画蛇添足的勾当”（《光明日报·文学》1982年8月19日）。这些，皆出于作者苦心浇灌、刻意创新的结果。

杨朔散文结构的首尾互应、彼此相

衔，特别值得一提。它们如黄鹂互唤、青山对峙，可谓臻于结构佳境。前面提到的《茶花赋》就是。结尾写“我得到了一幅画的构思”，即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，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，岂不正可以象征祖国的面貌？”这既是对“童子面茶花”描绘的结果，也是对开头的回应，扣住了篇首搁下的心思和疑局，含蓄而明朗地歌颂了祖国的面貌，给文章增添了颇有丰采的一笔，给读者以回思无穷的余地，具有一种意想不到却在情理之中的美感。由此可见，杨朔散文在进行结构时，总是同时考虑了开头和结尾的，不因它们各居一端而顾此失彼。梁代文论家刘勰主张“统首尾”，强调“惟首尾相援”（《文心雕龙·附会》）。杨朔在散文的开端结尾方面真是苦心求妙，因而具有独辟蹊径之功力。

### 三

杨朔写散文，很注重化散为聚，化平为奇，在结构上做到严密有致。而为了这一点，他往往借助于衔接、转折的过渡方式，使结构在一定的思想彩线钳制下，井然有序地展开下去，显得熟练、精巧。这是杨朔散文结构的又一个特色。

在杨朔的作品中，人、事、景、物、情、意、理的转化或推进，不仅做到了自然随和，毫不生硬，而且能使内容随之深化下去。其中有由远及近，由实到虚，又由虚到实，自然而巧妙地为“跳跃”到下文，积蓄气势，充满了哲理。例如《走进太阳里去》，一开篇就回忆抗战初期一支队伍从太行山往河北大平原移动，到了平原地带，战士们虽然十分困倦，但仍情绪饱满。在歌声笑语中，说要“比着走”，“走到太阳里去”。这是一句充满希望和信心、感人肺腑、含意深刻的话，是从斗争中创造出来的、富有哲理的语言。但队伍怎能走到太阳

里去呢？作品接下去写道：“这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，冲着东方，冲着刚升起的太阳，照直走去，每个人身上都闪着—派金光……”原来是迎着太阳走！然后，文意—转，即拉到眼前：“这支队伍当然走不进太阳里去，却走到了天安门前。”从而过渡到新中国成立六年来取得的伟大胜利的抒写与歌颂。这在结构上是一个大的转折，作了很好的过渡。在杨朔的作品中，乍—看，过渡有些生硬、做作，但他巧妙地采用了引而不发的、“软过渡”的方式，使“硬”的痕迹—抹而逝。又如《海市》，写在老宋家中见到摆设十分考究，像“新婚的洞房”，于是不禁赞叹道：“你们的生活真象神仙啊，富足得很。”按—般的结构行文，必然要写对方正面的回答，但作者却写道：“老宋含笑，也不回答，指着远处—带山坡问：‘看那是什么？’”接着写“那是一片坟墓，高高低低，坟头上长满蒿草”。这仿佛是新答非所问，所写的情景也同“富足”不沾边，显得有斧凿刀痕，而实际上是为了丰富和深化内容，引出过去生活的贫苦，用对比手法，说明是变革才带来了“神仙”般的幸福生活。这比直接写出富足和幸福的生活，不仅内容更扎实了，而且结构上也出现了起伏顿挫的姿态。

杨朔散文善于创造—种新颖、别致的过渡形式，除—般地起连接作用外，更有使内容扩展、收拢、转折、深化的作用。这样，作品往往在“山重水复”的曲折回环状态看似“无路”之时，却又辟出了“柳暗花明—村”的豁然开阔境界，将人物、事件、感受和思想情怀，有机地、灵巧地组织了起来，使作品的内容浑然—体，结构严密有致，给读者以甘美的艺术享受。

#### 四

杨朔散文的结构，可谓盘马弯弓，以巧服人。但必须强调指出，它们不是有人所说

的“故弄奇巧”，而是为了有效地抒写情怀，拓宽主题，深化思想。为此，它是很注意突现“意旨”的。

散文中的“意旨”，与作品流露的作者的思想感情、生活哲理密切相关，即大都是情、意、理的结合。刘勰说写文章“贯—为拯乱之药”（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），唐代诗人杜牧也认为“凡为文以意为主”（《答庄允书》）。杨朔在散文创作实践中，也深知这一点。他的散文结构，不管是层次段落的井然安排，或是过渡照应的巧妙有致，还是开头结尾的统筹互应，都是以—思想感情贯之，都是为了使思想表现得—更充分、—更深刻。这里主要靠有—个明确的“点”和“线”。点是集中、凝聚所在；线是串以全篇的经脉。例如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，全篇始终围绕“河流”抒写：由三门峡工程，写到长江大桥；由戈壁上的石油河，写到炼钢厂的钢铁洪流；由康藏公路上的车流，写到天安门前—的队伍急流。这些题材，都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贯串，宛如“驱万途于同归”（《文心雕龙·附会》）。这样，从不同的“—端”把生活的珍珠集中串连到“意旨”的链条上，做到了多样中求统一。因此，形似散乱的人、事、景、物、情，就集中地、强烈地传出了“意”或“神”，好似众多的铁屑被吸聚于—块磁铁周围，又像满架的葡萄出于—根主藤。宋人严羽说过：“语忌直，意忌浅，脉忌露，味忌短。”（《沧浪诗话》）散文正需要这样，要做到立意集中鲜明而文势纵横，紧凑严密。杨朔散文的结构，正是如此。

另外，在杨朔散文中，恰当地而娴熟地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和比喻、象征手法，将写人记事、绘景状物、言情述理，简洁而较自然地穿织铺写，也是使结构形成错综变幻的风姿的原因。比如在《海市》中，开篇是以抒情的笔调描绘海景，展开—幅精采迷人的画面；中间是对“烟笼雾绕”的海岛风光的描写，活画出奇丽喧腾的景象，而且插进了

对老宋一家的今昔对比记写，突出今天的生活富足得如“神仙”一样。因事抒情、即景生情，最后发抒感慨，加以议论：

……朋友，我现在记的并不是那渺渺茫茫的海市，而是一种真实的海市。如果你到我的故乡蓬莱去看海市蜃楼，时令不巧，看不见也不必失望，我倒劝你去看看这真实的海市，比起那缥缈的幻景还要有意思得多呢。

这真实的海市并非别处，就是长山列岛。

这样曲折动情的行文，使结构隽永多姿，很好地反映了思想意旨。

## 五

杨朔散文的结构，创造得如此富有特色，为很多人所赞赏和学习，是有其多方面因素的。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着意地、深入地认识、理解和感受生活的底蕴。散文的结构实际上是作者对外界事物的独特感受、掀起的激情在行文上的体现。杨朔长期从五彩斑斓的生活中刻意地寻求、分析和思索存在的矛盾和诗情。他认为“即使是很平常的日常生活，如果抓住其中的矛盾，照样会有震动人心的力量”（《我的感受》）。而生活总是错综复杂、千姿万态的，因此他还主张“要尽可能抓住主要矛盾，其它次要的小矛盾，都应围绕这个主要的矛盾发展”（《“三千里江山”写作漫谈》）。由于这样，反映在他的散文中的结构安排就曲折而严谨，实为生活本身的散文化的反映，而决不是离开生活、离开一定的“意旨”去故弄玄虚、追奇逐巧。

刘勰说：构思是“叙文之首术，谋篇之大端”（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）。杨朔散文的结构又是受作品的整个构思，即不仅包括立意，还包括确定作品的基调、剪裁等等所制约的，是整个构思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在构思

中，他特别注意从“动情的事”中寻觅诗意，让诗意成为散文中联系事物和情景的“契机”，成为各种表达方式全力表现的中心，更成为结构全篇的“中轴”。他还特别讲究“引而不发”，即不一下子说出，不直直地說出，不轻易地将蕴含的深意“施舍”给读者；而总是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，激起他们探求追思的急切心，犹如古人说的“藏锋不露”。由此，影响着结构显现出“顿挫”的艺术。

在散文的结构艺术上，杨朔还力学古典散文的长处。他的作品中的风神韵味，体现在结构的各个环节，很有古代散文简洁深邃的意味。例如在开端、结尾这些环节上，《雪浪花》和苏轼的《前赤壁赋》，尽管反映的思想感情有根本的不同，但其神韵、展开的自然景象，以及启开下文的作用，都具有同工之妙。可见，杨朔对于古典散文传统的修养，在结构艺术上，也有明显流露。

对于杨朔散文，有的评论者断言：在“优美的言词里藏着虚假”，在“精湛的构思中渗有欺骗”；在“结构上的雷同也表现得较明显”，说它是“开始提出一个问题，中间作些铺张渲染，写到关键处，笔锋一转，打个比喻，点出本意”，“形成一个公式”。（均见《光明日报·文学》1982年8月19日）笔者认为，这样评价杨朔的散文及其结构，是失之简单化的，是不够实事求是、未作具体分析。如果钻进去，仔细而全面地探讨，就可体会到：它并不那么严重。即使有比较明显的人工斧凿痕迹和某些矫揉造作之处，也是属于创造中出现的一些不足。对于这些，科学地予以指出，并加以科学的分析，是有好处的。但他散文中的特色、优点、成功之处，却是主要的，是值得今天的散文创作借鉴的。